

•智库要闻•

“新冠疫情与城市治理”线上研讨 暨第十二期东吴智库学者沙龙成功举办



4 月 29 日晚,由苏州大学东吴智库、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新冠疫情与城市治理”线上研讨暨第十二期东吴智库学者沙龙成功举办。

本次沙龙邀请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瑞士达沃斯论坛智囊机构“全球议程理事会网络”理事会理事刘建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湖北省政治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北改革智库“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唐皇凤,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师范大学 MPA 中心副主任、南京智库联盟城市治理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陈辉,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进华等专家学者进行分享和交流。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教授、东吴智库研究员、多位高校师生参加了本次沙龙。沙龙由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建洪教授主持。

与会专家就新冠疫情与城市治理相关话题进行了分享。刘建军教授通过关键节点、动员抗“疫”、权力让渡、撬动支点和专业回归这五个关键词,提出了自己对于后疫情时代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看法。他认为,此次新冠疫情应成为优

化基层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的关键节点,中国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所积累的数据优势、技术优势、专业优势等等,会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世界对话交往的一大支点。

唐皇凤教授结合身处武汉的见闻与调研,分析了基层动员中需要关注激励机制的精细化和可持续性。他指出,我国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可以凝练出三大宝贵经验,即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和网格化管理。

陈辉教授通过疫情相关数据的分析对比,结合全球化、现代化、技术化的社会背景,指出城市善治需要将国家能力与社区自治、统一性与多样性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中国的智慧的城市治理之道。

陈进华教授主要从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服务这一角度,从科技支撑、民生需求等维度,提出要注意将管理与服务融为一体,面向所有的城市居民,运用好社会组织的力量,推理城市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并在科技创新的大格局下更加提倡包容。

黄建洪教授对与会专家的发言进行了总结,并围绕“从新冠疫情治理反思城市韧性的构建维度”这一中心议题,指出

在城市治理方面,新冠疫情产生新需求、当前做法沿用老传统、实际面临多变量。他强调适用于工业化时期的管理思路和官僚构架在城市治理中具有片面性和脆弱性,城市治理中的“微循环”思维的运用与打造韧性城市息息相关,而新冠疫情下国家治理尺度的变量与现代化进程形成的各类关系将为城市治理带来更多复杂性。

在交流讨论阶段,专家们结合专题调研,就疫情期间组织动员机制、公共议题与专业议题的转化搭建、城市治理中社区的作用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教授还从城市规划角度,指出多中心模式、城市安全、社会建设、医疗投资、人员流动等问题在区域规划与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并强调城市治理中多学科交流合作的强大力量。

新型疫情发生以来,东吴智库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落实各项工作任务,针对疫情防控开展理论探索与政策建言,助力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作出智库贡献。相关工作情况先后被光明网、交汇点、江南时报网等媒体报道,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本期要目

- “新冠疫情与城市治理”线上研讨暨第十二期东吴智库学者沙龙成功举办
- 唐皇凤:后疫情时代城市治理的新变化
- 刘建军:后疫情时代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考
- 陈进华:后疫情时代城市治理的精细化
- 方世南: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



•专题研讨•

编者按：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是优化当代社会基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疫情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探索城市治理理念与方案的必要性则体现得愈为显著。

4 月 29 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唐皇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辉教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陈进华教授和黄建洪教授等专家学者受邀参加了由苏州大学东吴智库、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与南京智库联盟城市治理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后疫情时代的城市治理”专题线上研讨会。各位专家们就激发制度优势、统筹疫情防控与城市发展等话题，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度的交流与探讨，相关观点选编刊登于《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现将本次研讨成果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后疫情时代城市治理的新变化

唐皇凤

唐皇凤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城市治理与区域发展、公共安全与风险管理研究。

作为多种风险因素交织叠加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蔓延而成为“全球性流行病”。疫情防控成为对世界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成为检验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比较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的试金石。我们需要全面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长期影响，尤其关注疫情防控过程中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所呈现出来的明显短板，洞悉“危中之机”并有效“化危为机”，积极探寻后疫情时代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集中统一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的显著优势，通过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组织动员力和资源统筹力迅速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展现出较高的危机管理水平，充分彰显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活力和韧性。当然，这种强大的动员力只是一种外在的呈现，实质上却是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的充分体现，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积聚起来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与此同时，在我国的城市治理过程中，这种组织力带有一定程度

的权威动员色彩，使得动员模式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动力不足。这次疫情防控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其中，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抗疫中的广泛运用，为提升疫情防控效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也代表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趋向。如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建立的风险人群感知大数据平台，用于对疫情发展趋势的分析所研发的密切接触者测量仪，每个人只要输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就能够快速便捷地甄别是否为密切接触者。在医疗物资的保障调度、发热检测、药品筛选和疫苗研发、病毒溯源等方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都大有用武之地，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研发了重点医疗物资的保障调度平台，极好地实现了保障和调度的有效性和实时性。另外，海康威视、百度、旷视以及云天励飞等企业研发的各种各样的红外测量设备，通过与人工智能的辅助诊断手段相结合，可以快速识别发热患者，提高疫情防控的效率。因此，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城市治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有机结合，成为本次疫情防控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技术治理本身也是双刃剑，还有很多需要高度警惕的内生性风险。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该成为优化我国城市治理的关键节点，成为常态化疫情防控时代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拐点。此次疫情防控为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一）完善构建“四治”深度融

合和有机协同的城市治理体系我们需要构建以社会和政治秩序为前提和平台，以自治为发展目标和路径，以法治为基本方法和保障，以德治为辅助和有效补充的“四治”深度融合和有机协同的城市治理体系，具体包括：（1）优化城市治理的政治体系，关键是构建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构建职能优化、运行高效的政府负责体制，以及区域联动、部门协作的齐抓共管机制。（2）优化城市治理的自治体系，关键是完善基层群众、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自治机制，不断提升社区自治服务水平。（3）优化城市治理的法治体系，关键是要建设科学完备的市域法规体系、公正权威的市域法治实施体系以及规范严密的市域法治监督体系。（4）优化城市治理的德治体系，强化德治的引领作用，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全体市民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水平。推进“四治”的深度融合和有机协同，关键是构建基层党建引领下的自治共治格局，以激活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带动基层社会自治，创新共治模式。（二）给基层一线授权赋能，充分激发城市治理的创造性活力在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没人能预先获知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探索中前进，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逐渐揭开问题的真相。因此，给予基层一线人员足够的创新空间，充分信任基层一线人员并有效地授权赋能，是推进新时代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性工程。在

•专题研讨•

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我们要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充分发动群众,有效动员社区工作者、基层党员、网格员、志愿者、社工等多元主体,加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和网格化管理机制建设,在城乡社区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注重发挥社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化力量在专业援助、心理疏导等方面的作用,持续夯实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构建针对社区工作者的精细化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基层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城市治理的效能。(三)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升城市空间治理能力城市既是一个高风险的治理空间,也是一个治理问题高度专业化的空间。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人口和资源快速向城市集聚,城市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空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空间治理成为城市治理的主要阵地,具体举措包括:(1) 落实城市空间划分和管控。加快编制市域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划定“三区三线”^①,系统性构建城市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农业发展格局、城镇体系布局 and 产业发展格局,落实国土空间有效管控,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效率。打造以解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为出发点的社区 15 分钟生活圈,形成以均衡资源分配、保障社会民生、维护空间公正与组织地方生活为目标的城市生活空间。以“三区三线”和空间准入清单为载体,形成一套综合空间管控原则,科学指导城市空间的开发与保护。(2) 提

升城市生态环境品质。构建现代化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施以控制单元为基础的环境质量目标管理体系。实行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标准及产业准入环境标准;提高治污能力和水平,加强生态环境污染精准化监测、数字化决策以及智慧预警预报系统的建设与集成;保障湖泊连通、防汛抗旱、城市防洪、应急保障、生态修复及补偿等重点基础工程建设,提升排涝标准与防洪标准的衔接与统一,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垃圾分类管理模式。(3) 建立空间格局演化精准评估机制。构建空间格局动态评估和调整机制,准确掌握空间格局变化的本底状态,提升空间开发和保护动态监测信息化水平,辨识空间开发保护中的关键问题,按照不同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优化空间结构,实现国土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优化有序可控。(四)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城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目前,北京和上海等地都出台了加强城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意见,强调统筹完善公共卫生、医疗救治、物资保障、城市运行、社区治理等各环节,提升重大疫情防控能力。而健全集中统一高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领导指挥体系,完善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机制,强化部门职责、属地责任、社区管控、社会动员,推进区域协同合作,打造平战结合、专业化、复合型、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队伍,显著提升城市在疫

情监测、疾病救治、物资保障、科研攻关等方面的能力,则是推进城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完善平战结合、风险预警、危机管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和网格化管理机制,把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融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体系,建立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信息整合和协同治理机制,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疫情监测、排查、预警和防控工作,则是城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20 年 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武汉考察时强调:“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表明,风险和机遇是影响社会运动的两种力量,也是决定城市治理现代化模式和路径的决定性力量。城市治理过程中蕴含的巨大内生性风险,促使我们积极建构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预防、识别、处置城市治理风险的能力,确保城市社会的整体有序和生机活力。面对新时代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我们需要坚守三个基本立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领导地位;建设“自主性”国家,确保国家权力在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权威地位和主导作用;充分激活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力量,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治理现代化中的保障和支撑作用,为新时代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和技术基础。

后疫情时代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考

刘建军

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建设与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民政局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从事比较政治制度、基层政权与社会治理、城市政治学研究。

随着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抗疫,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就此引发关于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五点思考。(一) 抓住关键节点我们注意到,在很大程度上,中国

城市的发展不是一个渐进的、累积的发展。一些重大事件往往会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节点,一旦产生便具有不可逆性,导致后面的治理体制跟这个关键节点之

前的制度有一个路径的依赖。比如说 G 20、世博会、进博会、亚运会、上合组织峰会,这些都会成为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节点。但是,有的关键节点不是人为的制造,而是从天而降的,这次疫情就是这样。而此次疫情,应该成为优化治理的关键节点,成为后疫情时代优化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的治理拐点。换言之,这样的关键节点会成为城市治理的一个拐点。如果说我们没有抓住这个关键节点所带来的治理的拐点,疫情期间所累积的很多宝贵经验就有可能在后疫情时代流失。(二) 发

•专题研讨•

挥制度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从宏观看，“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充分体现在武汉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之中；从微观看，中国城市规划是封闭和半封闭的街坊制和小区制，街坊制和小区制的城市规划为“动员抗疫”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制度保障。街坊制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唐代长安城的里坊制，其城市规划的理念符合古代中国人的城市审美和生活审美。现代中国城市规划阶段，曾经有观点认为应该拆掉围墙，全部实行开放式的街区制，这也许并不适合中国人的生活审美、生活需要和日常安全。（三）注重权利让渡我们在社区调研时发现，房子的产权不是一个绝对的私有物权，房子是与其他房子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所有权人在此生活空间里必须要有部分的权利让渡观念。在此次的公共安全面前，正如以前我们所讲的普惠型福利一样，这一次疫情也是普害性灾难。普害性灾难对每个人的伤害程度都可能是平等的，为此在合作抗疫中就产生了权利让渡的曙光。这个曙光，或许在后疫情时代能够成为优化社会治理，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节点。（四）找准撬动支点在城

市社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治理生态”是与每个市民息息相关的，例如，垃圾分类在许多城市开始推行，每个人每天都会生产垃圾，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有与基层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比如水安全、消防安全、电梯安全等等，才能成为撬动社会治理的支点。找到了这些撬动支点，在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同时，就能够将许多资源串联在一起，整合在一起，从而达成更优的治理效能。（五）实现专业回归“专业回归”是指通过充分发挥专业技术的能力介入提升治理绩效。我们发现，中国基层社会的综合治理能力较强，但是专业化治理能力相对较弱。在此次疫情中，许多的问题都可以回归到专业治理能力上去，即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取得专业方面的成效。后疫情时代城市治理可以回归到具体的专业问题和技术问题上去。为此，中国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所积累的数据优势、技术优势、专业优势等等，将会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一个技术和专业的制高点。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城市治理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对组织动员机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后疫情时代这个

现象会愈加明显，更多的问题要靠组织动员去解决。二是城市的管理、资源、组织的下沉，诸如城管、房管、绿化等，但下沉容易导致基层难以承接和承受。这是因为，一旦下沉以后，管理的速度可能会很快，但专业化治理和专业化服务会出现短缺。这种短缺，或者说是过度地依靠组织动员会导致对很多专业化的普害性议题的敏感度降低，也就会关联性地引发对专业化、精细化的治理削弱。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人们会对社区、社会、制度、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更深理解。很多城市都因为一场大的灾难获得了一种再生，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禀赋、城市的性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为此，我坚定地认为，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一定会获得一种再生。后疫情时代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既需要关注关键节点、动员抗疫，又需要探讨权利让渡和撬动支点，与此同时还需要关注专业回归等一系列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后疫情时代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专业优势和制高点在哪里？专业回归应该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

后疫情时代城市治理的精细化

陈进华

陈进华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东吴智库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战略目标在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顶层设计的出台不仅是对当前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与数量几何级增长背后如何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的宏观反思，同样也是建立在亟需破解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城市精细化治理中凸

显出的一系列微观治理难题之上的。在此具体语境下，如何在城市治理中加快提供更好的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成为应对时代挑战、落实治理战略、释放治理效能的具体要求与路径选择。城市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服务聚焦于把管理和服务的工作深入到城市所有空间和所有人群，并且要解决企业和社会以及城镇居民生活和就业方方面面的问题。与传统粗放式城市治理模式不同的是，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服务在治理内容、参与主体、服务对象以及路径支撑等多方面都有着根本性的创新与转变，具体可以从三大维度进行理解：一是科技支撑，包括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强化科技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和实践。例如，在交通管理和治安管理方面，城市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以及各类感应系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城市管理能力，治安案件发生率大

幅度下降，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理能力大幅度提高，可以说科技提高了精细化管理的水平。二是关注个性化的民生需求。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决定胜利归属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民生领域的诸多个性化需求能否得到充分重视和有效满足已然成为这场战役中最大的变量之一。在疫情防控中应满足个性化民生需求，把管理和服务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和空间，覆盖到所有不同类型的人群。这不是技术可以替代的，更重要的是要转换政府职能，重塑政府官员的执政理念，建立完善的管理和服务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与实现每个人个性化与细致化的需求。三是端正工作作风。真正以人民当家做主的管理和服务理念去面对城市纷乱复杂的利益结构，及时有效地解决城市治理的各类难点问题，打造一个祥和、稳定、宜居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后疫情时代推动

•专题研讨•

城市治理的精细化,需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 要把管理和服务融为一体,扭转过往重管理、轻服务的畸形城市治理观,建构一种以服务优先,管理与服务并举的城市治理新格局。(2) 精细化治理要面对所有城镇居民,严禁户籍歧视,这是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增长的刚性要求。很多城市政府在推进精细化治理和服务的过程中,更多地把户籍居民放在首位,甚至在制定当地发展规划和社会治理方案的时候,把外来人口和进城务工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排斥在外,由此衍生出现代城市治理中的诸多棘手问题。(3) 必须防止“一刀切”政策的泛滥。一段时间以来,“一刀切”是城市治理“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但是由于政策思路和导向存在一些问题,各种“一刀切”政策也引致了新的利益矛盾,给城市治理以及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精细化治理和“一刀切”是治理方式的两个方面。精细化治理针对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展工作,因工作的极度细致而有效化解矛盾,有助于治理目标的完成。因此,精细化治理的提出,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城市政府官员盲目主观的决策模式,同时也要避免因“一刀切”导致政策实施被扩大化,进而伤及广大城市居民的利益。(4) 推动城市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的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地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我国逐渐进入城市型社会、市域社会,也就是以



不同量级、类型的城市(城镇)为运行、发展、治理节点的社会。厘清市域社会的趋势特点,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树立科学的市域理念、市域伦理,对加快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精细化、服务现代化,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具有基础性意义。(5) 面对科技创新的大格局,精细化治理更应提倡包容性。中国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在世界上发展实践速度最快,因此许多新兴的创新企业也应运而生。当这些创新企业和新经济模式出现的时候,必然会带来过去城市治理中未曾出现的问题,也会导致传统经营模式的抵触和反对。好在我们的城

市治理体制的最大优势就是不受各类利益主体的干预,因此给各类创新企业和行业提供了最大的发展空间。但是面对存在的问题,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规范要求,很可能会扼杀很多企业创新的机会,而城市里根据市场需求产生的创新产品也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这就要求在提出精细化治理的同时,给予创新空间提供更好的载体,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在包容性治理理念下,把精细化治理从具体细致的工作范畴上升到基于科学分析的执政理念的高度,这样的精细化治理才更能适应创新型社会发展的要求。

后疫情时代的城市韧性构建

黄建洪

黄建洪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吴智库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国家治理现代化、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

正如塔勒布所言:黑天鹅总是在人们料想不到的地方飞出来③。新冠疫情

就是这样的一只“黑天鹅”,其影响广泛涉及生命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城市治理绝非仅仅局限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范畴之内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疫情冲击波所造成的极限挑战,直逼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底线,形成全球性重大公共管理议题。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变量,与原来的现代化进程叠加所形成的动态与静态、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线上与线下、规划与建设、管理与运行、地上与地下、水域与空域、族群与代际、国内与国外、响应与协同、社

会网络与公众参与、公共与私域、结构与功能等诸多关系,对后续城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均会形成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城市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系统,然而诸多风险与城市森林共生,风险城市、风险社会已然而至。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交互界面和交往方式,因而城市治理也有了新的需求。特别是对生命与生活、生产与生态的较高融合度需求,前所未有。这里,我们关注城市韧性(Urban Resilience)在疫情面前的表现及其在后疫情时代的优化与构建。众所周知,多年来城市韧性的研究一直是学界

·专题研讨·

探讨的热点。究其原因,实质上是人们对现代城市所面临的种种复杂不确定性所做出的理论和实践回应。这之中,要害在于前瞻性地探索适应性的调整方法和建设路径,以确保城市具有持续不断的适应力、学习力和创新力,能够在各种自然的、社会的抑或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危险、灾难面前,有自我更新、自我恢复、自我发展的动态调整和系统平衡能力。因此,面对非预期性的新冠疫情这类突发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城市的结构韧性、过程韧性以及系统韧性表现如何,就构成了对城市治理质量的直接检验。疫情期间我们的城市治理,既沿用了以往组织动员的传统,又因实际面临多种新变量而广泛导入治理的技术资源,形成了治理的新效应。譬如,通过诸如“健康码+网格化+铁脚板”的组合模式,以组织动员为中轴的方式,将信息技术、群众路线与社会动员结合起来,形成广覆盖、深嵌入、高强度的效能治理格局,收到了颇为显著的疫情管控绩效。与此同时,将疫情治理与复工复产快速结合起来,通过产业链复工、管理链复工、服务链复工等方式致力于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与调整,也取得了积极成效。面向未来,基于社会实践结构的巨变,构建更有质量的城市韧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如下方面的问题:(一)更新城市治理观念面对城市韧性的提升需求,需要从平面的城市到立体的城市、从简单的城市到复杂的城市、从物质的城市到安全的城市转变,以均衡实现权利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空间化。城市不是孤岛,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群落,各类人群在此应该可以获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存和发展,城市的“中心—边缘”规划结构和粗放摊饼式建设模式,显然难以真正有效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城里的月光把梦想照亮”,第一要义还是要有安全保障、生存稳定、发展愿景,有“小目标”可以得到基于持续努力而循序实现的城市空间。韧性维度的城市治理,理念上需要更加明晰、更加牢固地确立物化城市的人本化和法治化转型,需要更有安全感、更有创新力、更有生活味。(二)更新城市治理构架既往适用于工业化初期和大工业时期的管理思路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内生的片面性和脆弱性。比如,“切块式”的职能模式,对于标准化、程式化的惯例事务得心应手;而对于诸如新冠肺

炎疫情一类的非常规性强烈冲击,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适应。疫情让我们反思,在特殊紧急情况下的适恰反应与效能行动,需要对现有城市治理构架做扁平化与服务性优化升级。循此,一方面可以更加系统地深入思考整合性的治理,在政府职责调整和治理工具优化方面,有更加集约和高效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持续导入下的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既确保效率、更确保安全,还凸显公正的内涵,可以通过系统集成、整合创新的方式给予更多的关注。(三)更新城市治理战略“拦水坝”思维难以“围栏拒险”,疏浚式的微循环思维、可持续发展思路则有助于提升城市的抗险能力和风险纾解能力。为此,需要对新时代下的城市有新的思考。譬如,选取走城市群的道路,或城际一体化发展的路子,实施“群组韧性”的战略,有助于对冲行政区治理所形成的“围堰”风险和强刺激危机冲击下的“堰塞湖”效应;又如开展韧性“仓库”建设,即对各类传统的、非传统的、显在的、潜在的风险,建立“风险档案库”或“风险账本”,基于城市区位、人口结构、产业形态、社会矛盾、利益断点以及卡档信息等,做好基础性的危源排摸、危点扫描以及危情研判,提供防患于未然的预见性;再如,结合城市地下空间、综合管廊规划等建设应急管理或紧急避难工程,围绕公共卫生和健康的更高要求,升级扩容城市防疫、救治、救助等公共项目,实施韧性工程的规划建设以提高城市管理和服能级,从而强化预防和治愈突发风险的核心能力。此外,从科技支撑、传统文化等方面寻求韧性智慧,建设更具包容力和宽容度的韧性文化,以及提高制度质量、政策针对性以及机制运行通畅度与协调性等方面提升韧性保障等,都是基于韧性战略更新带来的新考量。(四)更新城市治理尺度面对持续转变中的新阶段、新矛盾、新需求、新战略,城市治理需要有新策略,即基于实践需求的治理尺度新调整。一方面,基于城市权利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生态等发展需要,在历时性议题共时性呈现的大格局下,对城市治理的整体性策略与精细化策略要有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基于各种自然风险与“人造风险”叠加的态势,需要更为深切地关注应急管理、危机管理与风险治理的辩证关系,围绕城市的生命周期与危机的生命周期互嵌、互塑的实际,

设计城市韧性建设的新维度。从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经济—社会维度的演进韧性,可持续的治理行动中应更加深入地关注其过程导向,而非仅仅结果导向。将治理的“社区—城市—区域”全空间尺度与海绵城市、综合管廊、城市绿地、河流水系、轨道交通等韧性城市细分的全领域维度融合起来,将地区经济韧性、区域设施韧性、社区社会资本韧性以及社会组织韧性等有机结合起来,以持续有效地改善城市的自由与秩序基础,从而让城市在动态的系统运行中获得富有内涵和韧性的成长力量。(五)更新城市治理行动结合城市更新、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能级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等设计推进匹配性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尤其应在诸如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等重要领域有一个整体性提升。这里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城市空间的更新,与城市规划新取向要有融合度;二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做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居住等基础性资源的配置和保障至关重要;三是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人口的市民化应建立更为直接的关联,其中控制粗放增长的后置风险及其“工程烂尾”极其重要。城市行动的目标清晰性、资源整合性、动力持续性以及过程可参与性、结果的亲民性需要突破碎片化,否则支离破碎的各种城市问题的累积本身就会拖垮城市。(六)更新城市治理评价理性与温情在城市治理中缺一不可、相得益彰。这需要更多地关注“城市即人民”这一本质议题,将动态的安全观与系统的平衡观综合起来考虑城市治理究竟所欲何往。城市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随心所欲打扮的“小姑娘”,城市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同时她又深深地置身于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塑造有内涵、有力量、有气质和有温度的城市,让城市在传承、认同与创造方面都给人们以足以激发创新的不确定性和足以确保安全的确定性。构建有韧性的城市想象力和城市魅力,要致力于的“美好”不仅仅是城市地标、闪烁的霓虹和鳞次栉比的楼宇群,更多的则是创设产生城市思想、城市创造力的城市生态。唯此,我们才有可能既安顿好肉身,又抚慰好灵魂,才会在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同时,让我们自身也更加美好。



•专题研讨•

后疫情时代城市善治的内在机理

陈 辉

陈 辉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学博士, 南京智库联盟城市治理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 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 从事城市基层治理、文化权力与社会变迁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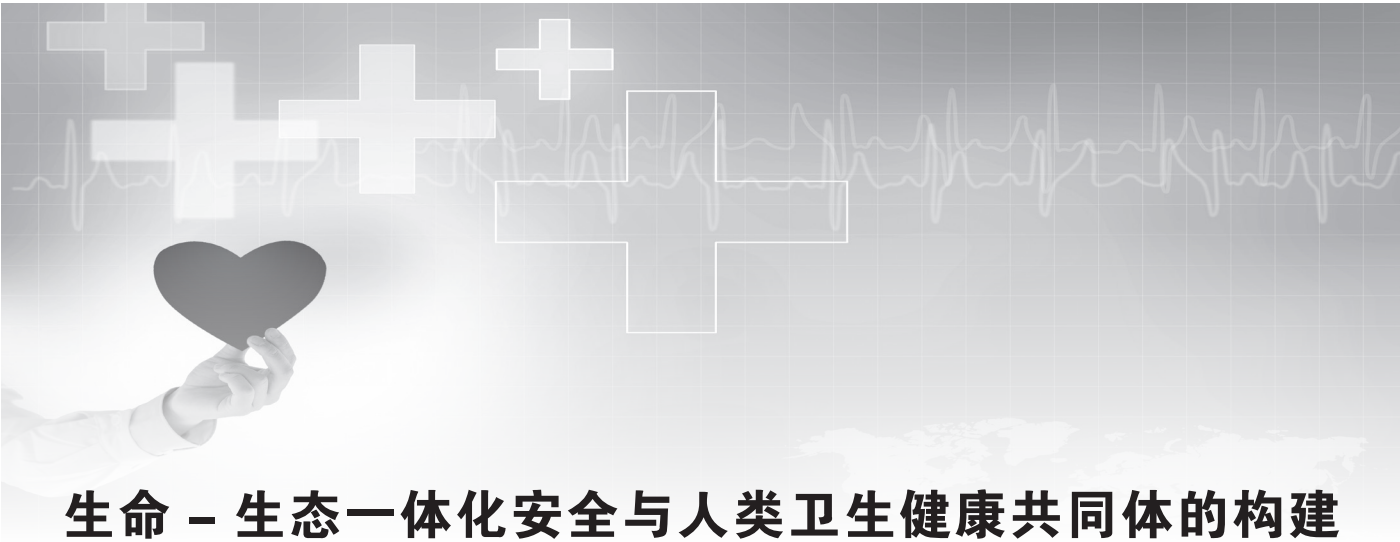
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二战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 当前, 只有个别国家为零感染率。通过数据模型演化, 可以发现新冠疫情以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扩散, 例如, 意大利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城市圈, 中国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 西班牙以首都马德里为中心、英国以伦敦为中心、美国以纽约为中心、俄罗斯以莫斯科为中心皆成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基于技术发展的全球化一方面使得各国居民以现代交通工具为载体, 往来更为便捷, 以城市为节点的公路、铁路以及国际航空将整个世界连接起来, 促进了产业链分工与经济效益的优化, 另一方面, 全球化也加速了病毒在世界的迅疾传播, 特别在交通便利、人群密集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就是说, 孕育现代化的两个基本要素: 全球化与技术化在给世人带来生活舒适、旅游便利、物质丰裕与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蕴含着深不可测的社会与技术风险, 这突出体现在城市生态的脆弱性与管治的不确定性。探寻城市善治的有效之道, 在于如何经由理性、审慎和反思实现城市的健康发展^③。回眸历史, 现代城市供水与排水网络的发展使得“19 世纪的世界病”霍乱逐步绝迹, 生活于那个时代的法国大文豪雨果曾言: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④。纵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原先疫情严重的东亚区域在疫情防控以及生产与生活秩序的恢复方面已初见成效, 除中国以外, 韩国也被国际社会视为疫情防控的优等生, 特别是首尔市的疫情防控, 究其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能够实施精准统一的疫情防控举措, 共享信息、相互交流。由于信息公开透明, 确保国民的知情权, 有效提升了政府的信任度, 得到国民的积极配合, 从而遏制疫情在城市的广

泛传播。首尔市疫情治理的具体举措为: 对病毒“检测追踪”“尽早发现”以及“尽快隔离”。从新冠病例数的曲线图来看, 东亚疫情曲线呈现从波峰往波谷的滑落趋势。反之, 如若政府间的政策不一, 甚至各行其是, 国家缺乏统一连贯且能够有效执行的疫情防控政策, 例如, 欧洲、北美和南美一些城市反而成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疫情呈波浪式发展。因此, 国家的能力建构与维系非常重要, 体现在安全秩序的供给力与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两个重要维度^⑤。城市治理历来存有两种基本范式, 即“大政府、小社会”与“小政府、大社会”: 前种范式基于科层制治理逻辑, 由政府包揽一切, 对于社会进行全面管控, 但由于政府不可能全知全能, 各级政府所具有的强大的资源动员与整合能力唯有在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强力指令下才能发挥出来, 科层制的治理结构往往会错过疫情治理的最佳时机, 且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后一种范式基于市场化治理逻辑, 有助于充分调动社会的活力, 尊重社会的自主性与市场的自发秩序, 但是在需要由国家所提供的整体性公共产品, 例如统一公共政策供给以及全民公共医疗保障等方面有所欠缺, 市场碎片性、公权力的软弱涣散以致过于注重短期利益, 导致城市治理失灵。因此, 城市善治需要超越科层制的“大政府、小社会”亦或市场化的“小政府、大社会”论争的窠臼, 形塑“强政府、强社会”的治理之道, 实现强大国家能力和社区自治能力。国家能力的优势在于有效治理, 维系城市运行秩序, 进行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社区自治的自发秩序有助于将疫情与危机遏制在萌芽状态, 并且有助于真实信息的传播, 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果。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认为, 无法达致统一的多元主义是混乱的, 失去多元主义的统一必然是暴政^①。实现国家治理宏观统一性和社区自治微观多样性的有机融合, 应是城市社会的善治之道。从城市生态系统有效运行的视角来看, 后疫情时代的城市治理需要突破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的防疫困境。城市治理如何以较小的经济成本取得较大的社会效果, 其效能优化路径在于吸收国家管理与社区自治两种治理体制的优点, 形塑中道的治理机制: 权威

的治理结构促进政策的贯彻实施, 包容性的治理方式规避社会治理与政府管制的内在缺陷, 超越国家抑或社会的单一治理逻辑。这种中道的治理使得社会治理有序, 且富有创造性与活力, 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②。政府高度重视依法行政, 建构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 优化医疗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管理主体与社区居民之间构建诸如议事会、听证会以及公众论坛等网络化、良性互动的机制平台, 提升社会资本, 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有效的合作、协调一致是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关键。这有助于有效防止将轻微的事件演变为严重的灾难。后疫情时代城市善治的内在机理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的医道智慧, 汉代“医圣”张仲景在《金匱要略》中认为高明的医生治未病,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认为“上工医未病之病, 中工医欲病之病, 下工医已病之病”, 说明了高明的医生治疗未病之病, 一般的医生仅仅是治疗疾病而已, 体现了“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卫生理念。由此回到城市治理上来看, 需要建设有预见性的政府, 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注重信息的公开透明, 优化社区在疫情治理中的预防与应对能力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在城市治理的科层制与市场化的运行过程中, 我们要重视国家在其中所发挥“元治理”的作用, 推动现代公共卫生服务网络的建构与完善。



•战疫观点•



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

方世南

突如其来疯狂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这一直接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公共卫生事件,凸显了全球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以及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构建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的新课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作为人类命运的“命”就是生命,需要生命安全加以保障,作为人类命运的“运”则是确保生命存在和发展的生态,需要生态安全加以保障。而人类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并非线性型单独发生作用的安全问题,而是辩证交互作用的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问题。只有充分认识以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确立以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

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方案,明确以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发展的基本路径,我们才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赋予的磅礴力量,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悬崖绝壁处寻找新的出路,共建共享有利于人类普遍繁荣与持久和平稳定的安全世界、健康世界、美丽世界。

一、以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理念作为观念的理性提升,是实践活动的指导和先导。理念的清晰性、科学性和基本规定性对于认识活动、实践活动至

关重要。深刻把握以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有助于深刻把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蕴涵的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问题,也有助于明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和价值目标。

(一)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蕴含的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问题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共处于同一个地球有着共同的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以及维护共同的生态权益和生命权益要求的组合体,也是一种超越民族、种族、国家、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的界限而形成的为了争取人类整体性利益实现和开创未来发展愿景的组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命”,就是人类的生命,人类生命的价值要以有助于人类卫生健康的生命安全加以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运”,不仅是指影响人类之命的机遇,而且更主要指向人类生命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这要以确保人类卫生健康的生态安全加以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以人类生命和自然生态一体化安全为价值诉求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要以生命 - 生态一体化安全加以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指向创造人类所有成员幸福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揭示了人类只有平等相处、守望相助,共同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秉承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使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共享共同体的理念,才



•战疫观点•

能确保有助于人类世代永续发展的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

卫生健康问题是人类最为基本和最共性的公共利益问题，是无关国界、无关性别年龄、无关民族种族、无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超越了人们的阶级等级、地位、名誉、财富等差异性，体现出全人类最关注、最有共同利益的关乎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普适性问题。尽管人权具有多样性的丰富内容，但是，尊重人类基于生命安全的平等的生命健康权等基本人权，是事关人类生命价值、生活质量和生存发展意义的重大问题。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出于应对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生命－生态一体化危机而形成的共同体，其目的是增进全人类共同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以实现人类世代永续发展这个根本大计。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从本质上看，并不是两个各自独立和各司其职的共同体，而是两个因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所构成的紧密关联的共同体，或者说，是因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所构成具有辩证关系的同一个共同体。

（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凸显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的价值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人类卫生健康的基本要求和生命安全的价值诉求，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论走向现实，从抽象走向具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人类如何更加安全地生存和发展以确保生命安全的客观内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为了解决影响人类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而构成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追求是维护人类卫生健康，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的生命健康权，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福祉和整体性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互动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都是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的内在要求所推动形成的共同体。人类在卫生健康共同体方面的努力助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则起着切实保障和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两者都促进人类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整体一体化安全这一目的顺利达成，推动人类一步步地走向健康世界、美丽世界和安全世界。



（三）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的基本内涵

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是对传统的就生命安全、生态安全单独看待的线性型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纠偏，是突破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各自为政的界限，从更宏大的生命－生态一体化高度看待人类安全问题的一种整体性安全理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处于相互交织、辩证互动的客观态势下，生命生态化和生态生命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所谓生命生态化，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生命依赖于生态而存在和发展，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的生命健康不仅仅是医疗卫生问题，而且还与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重要基础的生态环境紧密关联。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人类生命与地球生态直接关联，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影响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影响人类生活质量和整体安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人类历史的前提时，就既包括了个人的生命意义上的肉体组织、生理特征，受生命肉体组织所制约的人与自然界的关 系，还包括影响生命的各种自然因素，如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这些因素都是对人的生命和实践活动起着决定性和制约性的客观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所谓生态生命化，就是人类生命所发生对象性关系的生态环境从对人

类的影响而言，其实也是有思想、有情感、有记忆的，生态与生命一直都发生着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互动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揭示的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现象就突出地昭示了这一点：“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直接在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上体现出来。我国古人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说法，十分形象地道出了生态安全对生命安全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正是基于生命生态化和生态生命化双向融合运行的发展趋势，世界卫生组织站在全球人类整体生态－生命一体化健康角度提出了“同一个健康”原则，这个原则与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的“同一个安全”原则是一致的。“同一个健康”是世界卫生组织 2010 年提出的一个用来从整体上谋划与实施规划、政策、立法和研究活动的方针，目的是多个部门借此进行交流并携手合作，以实现更好的公共卫生结果。而人类“同一个健康”的目的是人类的“同一个安全”，人类的“同一个健康”和“同一个安全”就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视野看，注重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是人类有效应对生命－生态一体化危机和维护全人类生态权益与生命权益这个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是构建“同一个健康”和“同一个安全”这一价值目

•战疫观点•

标的必要举措，是携手国际合作推进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从而走向美丽世界、健康世界和安全世界的必经之路。

二、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大价值

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由人类所面临的严峻生态危机影响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人类生命不安全和身体不健康又加剧生态危机的客观情势所决定的，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有效应对生命－生态一体化危机的有效法宝，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紧张导致的人－自然－社会一体化的综合性危机和全球性风险总爆发现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从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高度谋划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重大战略思考。

（一）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助于应对日益严峻的生命－生态一体化危机

因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和人与社会关系紧张的人类文明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面临如此严峻而险恶的挑战，呈现出如同《风险社会》作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人类生命和生存正处于“文明火山口”上的危险境地。如果物欲膨胀、功利至上、唯利是图、及时行乐，以及在国际关系上奉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个人主义，以征服者、改造者的强者姿态对待自然界和社会，只能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矛盾并存和双重撕裂，形成生命与生态双重叠加的整体性不安全。美国大流感、加拿大暴风雪、尼日利亚不明疾病、澳大利亚大火、东非蝗灾、南

极血雪、北极冰川融化、喜马拉雅山顶上长出“绿头发”、菲律宾火山爆发、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粮食等资源危机，都拉响了人类生命－生态一体化总体不安全的刺耳警报声。人类生命－生态一体化危机的客观形势，亟待需要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意识，牢固确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关系的理念，本着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共同理想，加快构建人类生命－生态一体化总体性安全格局，以维护人类共同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因此，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并不是人们主观个人意志的设想，而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人类努力应对所面临的生命－生态一体化危机这一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必然趋势。

（二）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助于彰显将生命价值与生态价值融为一体的生命－生态一体化价值的新价值观

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都是显示出强烈价值色彩并用于价值创造的价值诉求。人类生命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世界上所有的价值归根结底都是基于人类生命之上的物质创造、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都体现出生命价值是最有价值的价值，是创造价值的价值之本，是世界上所有的价值之源。以追求物质财富、物质产品、物质享受为表现形式的经济理性对于人的生命固然有着重大意义，但是，这不是第一性的。经济理性必须让位于生命理性和生态理性。而生命理性和生态理性所注重的是个体生命的价值与人类整体性生命的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的有机统一，是生命的自然价值与生命的社会文化价值

的有机统一，是生命的代内价值与生命的代际价值的有机统一。

人类的生命价值是通过生态价值和人类卫生健康加以维系的。当今世界著名的生命政治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将人的生命和政治联系起来，提醒人们要注重生命政治的价值，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价值观，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生命的最高价值和目的，追求人类生命的自由和解放。齐泽克将生命的解放分为生命的内在解放和生命的外在解放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所谓生命的内在解放就是指生命要从自我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使生命成为自立自强富有创造活力的生命。所谓生命的外在解放则意味着生命的安全、福利、自由的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助于人类生命的自由和解放。人类生命的价值是与生态的价值紧密联系着的，自然是生命之母，生命是在生态环境中生成和发展的。“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只有牢固地确立将生命价值和生态价值融为一体的生命－生态一体化价值的新价值观，才能端正人类价值取向，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朝着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方向一体化构建。

（三）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助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建共享健康美丽的安全世界

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战疫观点•



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应问题而生和解决问题而来的客观选择。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注重的是应对全球性的生命－生态一体化危机问题，要克服的是将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切割开来治理的做法，促进条块分割的局部性安全管理体系有机整合起来，形成系统性安全理念并推动系统性安全体制机制以及实践活动，从而取得最大化的治理绩效。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由卫生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传染病等影响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环境污染问题都有跨国界、跨区域全球传播的特性所决定的。面对生命－生态一体化危机，单一的民族和国家难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必须依靠全人类的资源整合、力量整合、信息知识整合、科学技术整合、研究成果分享才能化危为机。因此，在应对影响全人类命运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生态危机中，必须彻底改变世界各国单兵作战、力量分散、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治理方式，彻底摒弃片面优先、相互指责、另立门户、以邻为壑等做法，以携手合作、风雨同舟的姿态，维护好全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和生态权益。

三、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要路径

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复杂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涉及人类理念更新、体制机制创新、实践方式革新等诸多方面的重大任务。

（一）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更新

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首先人类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文化观念问题。为此，世界各国都要按照客观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要根据前现代性、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由于时空巨大转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理念更新。与此同时，世界各国都要按照现代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紧密融合形成一体化安全的现代安全理念的新特点进行理念更新。

一方面，时空转换推动着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更新。在前现代性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以及交通的不发达，人类的生产方式、交通方式、交往方式都处于相对闭塞状态，世界各国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区域之间尚处于如同老子所说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人类实践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很有限，人类生命－生态一体化危机往往局限于范围相对较小的区域，人们通过有限的个体力量和相对较小的群体力量与疾病和生态危机抗争。现代性则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新的世界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全球性交往和世界市场的迅速形成，各国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流动，世界逐渐联结成一个人类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地球村”或“地球宇宙飞船”。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文化交往全球化、生态危机全球化以及病毒全球化。在生态危机和公共卫生健康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于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的理想境界，都无法洁身自好和独善其身。只有以风雨同舟和守望相助的姿态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凝聚合力共同战胜疫情病魔，确保人类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

另一方面，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紧密关联性推动着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更新。人类历史上的生态危机总是与生命危机紧密关联着的。霍乱是国际检验的三种烈性传染病之一，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一种急性烈性肠道传染疾病，特点是发病急、传播快、致死率极高，是人类将排泄物倒入水中污染了水源才滋生了霍乱。而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都应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有着密切关系，都是人类扰乱和破坏了与自然界协调平衡关系产生的恶果。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指出：“商业化了的自然界、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不仅在生态学意义上，而且在实存本身的意义上，切断了人的生命氛围。”这充分说明，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才能确保生态安全，而生态安全了，才能确保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是奢侈品，而是人类安全和社会进步的坚实基础。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又构成一个安全共生体，形成生命－生态一体化总体安全的新格局。因此，也只有打破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各自的边界界限，注重生态健康、生态安全和生命健康、生命安全之间的辩证互动，才能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形成和发展。

（二）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体制机制创新

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创新，任务繁多，涉及面广，世界各国应在生态安全体制机制与生命安全体制机制中找到有机结合点加以推进。一方面，要将生态安全体制机制与生命安全体制机制有机整合起来一体化构建。许多国家以往在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培育公民的文明健康生活方式问题上，在行政管理体制上，都存在着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格局。按照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构建要求，在卫生健康工作、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公共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等各项工作过程中，应该融合进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树立良好饮食风尚、推广文明

•战疫观点•

健康生活习惯等内容,要将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理念全面地融入生态文明建设 and 公共卫生健康的所有政策,要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另一方面,世界各国要按照生态安全影响生命安全以及生命安全又反作用于生态安全的客观规律,健全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一体化联动的预警响应机制,把增强对生态环境异常与生命安全异常的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生态文明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当务之急,要进一步完善生态危机和传染病疫情以及突发生态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系统,改进对生态危机和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的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在人,关键在高素质专业知识复合型人才。要按照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一体化的要求,世界各国都要深化专业知识复合型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复合型人才的发现、培养、激励机制。通过充分发挥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作用,促使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更好地释放效能。

(三) 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践方式革新

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实践方式革新是对世界各国传统的教育方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的全面综合性的整体革新。其一,对传统教育方式的革新。教育实践活动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对于人的素质提升具有重大作用。在传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成人教育,

都相当缺乏生态安全教育与生命安全教育的内容,更缺乏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教育的内容,在教材内容、课程安排、教师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长期淡化、弱化、边缘化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以及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的内容,使人们难以形成强烈的爱护生命意识和保护生态意识,从而在实践中缺乏生命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的指导,也缺乏安全意识、风险意识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意识,使人容易成为片面发展的人。针对当今时代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一体化爆发的突出特点,在世界各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中,都亟待加强对于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一体化教育,倡导“遵循积极取向、发展性取向和生态化取向”,以增强教育对象具备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知识、技能,以积极应对生命与生态的一体化危机。其二,对传统管理方式的革新。管理方式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在实践中会产生正向和负向不同后果。传统的管理方式是经验型的条块分割的线性管理和多头管理,是注重从上到下的压力传导式管理而忽视将从上到下与从下到上结合起来的互馈式管理,并忽视基层管理。尽管目前国内外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管理门类众多,从表面上看,世界各国应对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的管理部门绰绰有余,但是,由于关涉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公共卫生健康管理部门、消防部门、应急管理部门与关涉生态安全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国土规划管理部门、水务管理部门、森林管理部门、草原管理部门、湖泊管理部门、海洋管理部门、天空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协作联动,国与国之间的

协调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不够,以及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针对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和反馈能力都存在着亟需改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应对生命-生态一体化危机时就明显地暴露出了短板和弱项。对传统管理方式的革新,就是要根据新形势下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对管理变革的新要求,通过管理方式的调整和重组,发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管理优势和基层管理的优势,增强世界各国应对重大生态危机和重大公共卫生健康突发事件的能力。其三,对生活方式的革新。生活方式作为人们一切生活实践活动的典型方式和特征的总和,与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直接关联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对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产生不同的影响,直接关系到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程度。美好生活要通过美好生活方式表现出来,而美好生活方式就是有助于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的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将大力遏制烟草生产和消费看作比治疗肺癌更重要,将促进心理健康看作比治疗心理疾病更重要,将提倡健康饮食看作比治疗肥胖、糖尿病、心脏病更重要,将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一体化地建设,有助于将敬畏自然与敬畏生命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公民掌握科学的生态健康和身体健康以及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知识,树立良好饮食风尚,爱护环境,推广文明健康生活习惯,从而体现出社会文明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程度,反映出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以及生态文明实际水平,显示出以生命-生态一体化安全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取得的成效。

